

微观经济学读书报告

书名：《城乡中国（下）》周其仁【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

姓名：毛仲达

学号 3170101924

院系：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国际政治

2018年6月10日星期日

看土地的真实弹性

周其仁先生的《城乡中国》是聚焦在中国城乡差距之上把握中国经济脉搏的作品集。本文选取《城乡中国（下）》中的部分文章，用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理解和阐述。

在《辨“土地供求无弹性”》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土地很特殊，供应无弹性”，认为土地的供给不会随人口的增加和人们对土地产出的需要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点在作者看来，应该很容易看出错误，他说：“人口能繁衍起来，本身就是土地（自然资源）供给极富弹性的一个证明。”这个弹性并不是单纯来自土地的量，“技术”的因素才是更为重要的。技术的进步使得土地的边际产量增加，从而能满足的需求就更大。作者给出了经济学家 Esther Boserup 的发现：“较高的人口密度不但是土地较高生产率的结果，而且也推动人们从事更技术密集的农业活动，如增加复种指数、使用畜力、改善种子和肥料、采用更新的耕作技术以提升单位产出。”所以技术加持的条件下，土地的供应对需求的反应可以超越“量”的灵活。同时，作者还指出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大田”和“自留地”的例子一刀见血地把人的劳动热情和土地的供给的弹性联系在一起。这一点证明了对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影响着土地（或者说农产品）供给的弹性系数。种“大田”和种“自留地”的人是同一批人，从两者的产出对比就知道，农民的生产能力在“大田”的制度下是过剩的，只要制度改变，引入价格机制改种“自留地”，相应的弹性自然就表现出来了。

上面的重点还只是在农业用地之上。但其实非农业用地的“技术弹性”应该比前者更显著。一块农地无论怎么种，技术能拉伸的弹性也比不上后者多盖一层住宅这么简单高效，更何况只多盖一层根本就赶不上现代化的脚步。但是在现实中，作者指出，管制的割裂确实造成了土地变得“刚性”。国土部门只批地，其他行政部门只管限高，“刚需”超过供给的假象就出现了。制度如此，然而观念的障碍比制度更难克服。“想来想去”土地都是无弹性的，那就别让价格机制起作用，给土地的供需套上制度的限制。殊不知，这一套上，价格真的就不起作用，达到“无弹性理论”上的自洽了。正确的做法，是让土地尽其所能表现空间上的

弹性，让技术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里的技术因素和一般商品市场中的技术因素的作用看似是矛盾的，其矛盾点就在于制度不小心划定了供给的上限，技术根本来不及发挥作用就被截留在半空中。

更进一步，作者在之后的《辨“土地配置靠规划，不靠市场”》中详细给出了给土地套上的制度限制是如何运作的。在简单介绍了“规划”的概念之后，作者以英国的城镇规划为例讲述了“城镇规划”的历史由来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纷争。“分歧和冲突的产生不是因为非理性，而是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在各自理性地寻求其不同的目标。”这是作者引用的1963年的《英国城乡规划》中的译文，也是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的艰难的实践并最终碰壁之后得出的。政府的理性和市场的理性到底哪一个更理性是一个不能言绝对的话题，但是单纯的“政府理性”对于市场来说怎么看都是很大的“非理性”因素。

其后的《规划出错催生市场》《管制不当激活黑市》缺少弹性的制度所引起的不良后果方面反证了市场多一点自由也能多一点弹性。经济上接纳了市场机制，经济就活了，人也活了，看上去是“非理性”的因素增加了，但其实只是众多的曾被压抑的“理性”的排列组合被释放了。这么多的排列组合当然不是规划所能完全兼容的。规划压不住的“非理性”如果真的是“非理性”，那么价格机制也不会起什么作用。所幸的是，市场在躲开规划的角落里帮着维护了“规划”的脸面，可以确认所谓的“非理性”因素们在价格面前是能够保持理性的。而“政府理性”并非没有出路，出路就在帮助土地市场找到接近“帕累托最优”的方法，争取“总的净损害”最小。

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转让权的政治经济学》里，作者给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产权。科斯说市场的基础是清楚界定的财产权利。中国在“集体经济”的框架中划出的这一条产权线解决了中国的温饱问题，要继续达成富裕的目的，转让权的有效行使和保障越来越重要。在保障转让权的视角下，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权威”的弱小和强大，都不利于保障转让权。前者放任了市场中权利主体之间的不法侵害，后者则亲自参与到侵害的行动之中。

作者通过数篇文章想要表达的，是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应该看到其真正所拥有的弹性，应该受到市场价格机制更自由的调整，不能因为担心市场失灵的出现就抓住权力不放。当然，作者文章的目的是呼吁疏通固化的体制，并非是国家真的不懂这里蕴含的经济学原理。